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INCE 1964

中山大學報

对话名医

2014年11月1日

2009年，中山大学为15名在校服务超过50年的校园工作者颁发“卓越服务”奖，管忠震的名字赫然在列。50年间，心系母校，心系国家，心系人民成为管教授一生的追求。正是在服务肿瘤医院的50年中，管教授促成了肿瘤化疗领域第一本教材的诞生、在国内首先报告阿霉素的临床应用经验、开创何杰金氏病的“中国模式”、创建首家国家新药临床试验研究基地，医学上的成就使他获得“中大资深名医”的终身荣誉，名列榜首。



一步一足印　一生一追寻

——访中山大学资深名医管忠震教授

※ 本报记者：区丹棋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1990年UICC大会上提出的治疗何杰金氏病的“中国模式”，何以震惊世界？

管忠震（以下简称“管”）：美国斯坦福大学的Kaplan教授主张治疗何杰金氏病的模式曾是全球治疗的标准，但我当时感到这不符合中国情况，一是放疗前的剖腹手术会伤害病人身体，二是当时国内无足够的放疗、外科医生。所以我提出了简化分期诊断操作、以全身化疗为主、侵犯野补充放疗为辅的治疗策略，并很快运用到临床，取得了几十例的成功经验。虽谈不上震惊世界，但此次报告引起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同行的关注。随后全球标准模式的演化证明我们当初的思路是对的，国内医学的学习和发展不能仅盯住国外先进技术，而应根据本土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才是对病人生命的负责。

记：谈到责任这一点，您在医学上卓然的成就便是对此最好的阐释。您是如何理解对病人生命负责的呢？

管：首先，时代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广州解放前夕入学岭南大学医学院，读书期间经历了抗美援朝，又是新中国第一批医学毕业生，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一种使命感，而我决定以医者的责任来践行它。其次，在中山二院内科长达11年的工作中，老师们的教学对我的影响很大。譬如严棠教授，总是让我们先尝试自行分析、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如点头认可我们就自行处理，若有不当之处则加以指点，不了解的地方则诚实地表示待查阅或思考后予以解答；还有陈普照老师，他查房时会详细地分析每个病人的情况，清晰地交代思路。有一次，他在检查一个病人血液时发现一个陌生的细胞，为不乱细胞的位置，他用夹片固定住玻片，捧着显微镜专程坐公交车从长堤到东山校本部的病理教研室去请教秦光煜教授，这股学习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令人动容。老师们身上的精神奠定了我日后工作的态度。

记：肿瘤内科如今成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最具实力的肿瘤化疗学术梯队之一，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这一切呢？

管：改革开放前受制于闭关自守的态度和国内封闭的学习条件，有限的学习资源完全不能支撑起肿瘤内科对医治疾病的需求。改革开放后，我们很快与国外的肿瘤内科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一是日名古屋大学，其院长木村禧代二常邀请我们参加一年一度的肿瘤学学术会议；二是通过与德国著名肿瘤协作组织BFM的三地学者的讨论学习，和科隆大学的互换交流，使我们极快地成长起来；三是80年代，我在美安德森癌症中心进修学习，逐步明确专科发展的努力方向；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向药学界专家如韩锐、胥彬及筹建肿瘤内科时的顾问潘启超教授还有当时国内唯一生产抗癌药的上海第十二抗癌药工厂密切合作，可以说我国肿瘤化疗学科的发展与药学界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如果同行认定你和他们有相同的奋斗目标，就会无私给予援助：美国麻省总医院一次来了代表团，临走前咨询我有没有《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答应回去后寄一份给我，就这样从七十年代至今，这份世界顶级医学周刊一直免费寄给我，从未中断。

此外，医院平等待人、人尽其才这革新的管理理念出色地贯彻至今，这离不开第二、第三代人的努力。我曾经的学生如今都是国内颇具盛名的肿瘤内科专家，如现任院长徐瑞华，及张力、姜文奇、黄慧强、林桐榆等教授，正是他们认认真真地工作，才使肿瘤内科在全国有一席之地。

记：您创建国内最早的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研究机构之一、国内首家“国家新药临床试验研究基地”，过程一定不易，可否谈谈背景和个中艰辛？

管：国家药审中心（CFDA），为规范和审批国产药的研制、生产，规范新药的检测和推广，起初设置了一批新药临床试验基地。随后国家科技部为提高我国医药科学水平，使国内研发的新药能达到国际水平取得认可，于是在新药试验基地的基础上又设置一批国家级临床研究基地。而我们之所以能成为首家通过科技部验收的国家级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基地，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药物的研发必须遵循严谨的科学流程不可有丝毫疏忽，这种清晰的方向感带领我们迈向成功，于是我们仔细研究、逐步摸索国外的临床试验和FDA的规范克服了许多困难。这一国家新药基地是我科同仁精诚团结，认真学习、日夜奋战努力取得的成果。

记：教授在医学上的成就如此卓然，想必在家庭上一定有所牺牲。

管：这是比较遗憾的，我觉得我对父母和家庭的关心不足。当年父亲获悉我当院长后，说：“当个大医生还不如小医生。”他的内心还是想我多照顾他们的。后来他身体不好，我也来不及照顾他。事实上我所有精力和心血都投进了医院，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了。

记：对于新生代的医学生，您有什么期望和告诫呢？

管：医学是进步很快的学科，靠老本吃饭是不行的，一代代人需不断学习。我常和年轻医师说，虽然我们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但千万不能骄傲自满，同行在规模和水平上的发展、进步是飞快的，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如成都华西医院和河南郑州肿瘤医院，发展至今已有五六千张病床，更不必提北京、上海的同行在许多方面领先的研究水平。所以要保持自身的优势就需持之以恒地付出汗水和精力，一定要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另外，医学是包含医学基础原理和临床实践两个方面的科学，所以在提高临床水平的同时不可放松对基础医学理论衍变的研究，这样才能赶上国际水平。

《华严经》中有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不忘记自己最初的想法，才能有始有终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很幸运，我一生都在为我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

不忘初心

——访中山大学资深名医万德森教授

※ 采写：林倩倩

寒门苦读　扬起理想之航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走上从医的道路？可以说学医是我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我13岁的时候开始萌芽——1953年3月5日的深夜，居委会阿姨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带来了约瑟夫·斯大林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在莫斯科逝世的噩耗，举国人民深痛哀悼，那时我就想：“如果我是医生就好了，我就能救活斯大林。”同年夏天，有一天我肚子痛得打滚，被确诊为阑尾炎，当晚做了手术，此后，我对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敬佩不已，这更坚定了我学医的决心。

然而，对于刚刚小学毕业的我来说，到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路程还非常遥远。父亲早逝，母亲独立支撑一个家非常辛苦，所以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想选择一所机械类学校，学习一技之长，早些就业以便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得知我的想法后，正在读师范的哥哥连夜从学校赶回来与我促膝长谈，劝我继续念高中，不要放弃理想。高中时期，我白天当学生，晚上去夜校当老师上扫盲课。当时一份快餐1毛钱，教一晚课可以得到8毛钱的报酬，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收入。哥哥毕业之后，工资的大部分都用来供我读书。为了我的理想，家人付出的非常多。时代的召唤、家庭的期望，让我离理想越来越近。

师恩难忘　苦练悬壶技艺

1959年，我考进了中山医科大学，终于敲开了理想的大门。1964年，全国各行各业都进行“大比武”，学校派8名学生代表中山医学院去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实习的这一年，对我来说受益终生。协和医院对实习医生的训练非常严格，24小时负责制，过着医院、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两周才允许外出10小时，不论男女医生晚上睡觉都不锁门，随时准备被召唤回病房，所有的临床问题，第一时间找的都是实习医生，那时实习医生工作繁忙，虽然累，但无比充实。

见习期间，我的第一个见习老师是内科的唐世聪医师，他强调问病前首先要跟病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多关心病人，注重跟病人的讲话方式，他与患者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由于欣赏唐老师的沟通艺术，分科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写的是内科，第二志愿是内科，第三志愿还是内科。可是由于岗位配置和名额受限等多方面原因，我被医院分配到外科，从此与外科结下不解之缘。在外科实习中，著名外科专家曾宪九教授手术沉着、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震撼了我，他强调术前要精心准备，手术时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我对他的教诲铭记心中，受益终生。1965年实习结束回广州后，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号召，我被分配到李国材教授的下乡医疗队，李国材教授对工作的认真与执着深深影响了我。从医疗队回来后，也就是1966年的1月我开始到肿瘤医院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敬畏生命　倡导医学人文

我至今无法忘记文革期间，肿瘤小分队来到中山市小榄镇，一位父亲带着16岁的女儿来求医，诊断为骨肉瘤，以当时的医学水平，惟有截肢，但是父亲不忍看如花的女儿失去一条腿，坚持保守治疗，结果女孩的腿溃烂的越来越严重，医生从她腿内夹出100多条蛆虫，女孩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最终悲惨死去。还有一个病例，右上臂肿瘤，患者去过多家医院，都不能确诊，医生们建议截肢。最后，通过对病人详细检查，组织了多次会诊，确诊为右肱骨尤文氏瘤，实施了正确的治疗方案，为患者保住了手臂。医者父母心，作为医生，我们对病人要有同情心，生命只有一次，要真真切切把病人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来对待，采用正确的诊疗方法，不能因为顺从家属的意愿而不遵从科学的判断，也不能因为草率的诊断而造成病人身体不该有的残缺。工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处理方式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要慎之又慎。

在加入到肿瘤医院的几十年里，我主攻大肠癌。病情严重的病人，需要进行人工肛门手术，这对病人的身心打击非常大，虽然生命被挽救了，但是还要面临各种并发症并面对生理的巨大变化，这往往让病人很难接受。记得有个小伙子被告知要做造口手术后，他感到绝望，他的女朋友问我：“医生，能不能把我的肛门给他？”这样的真挚情感让人震撼，所以，在手术台上面对即使已经判定要做造口的病人，在手术中我仍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争取为病人保肛，因为他们一张张恳求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倾力办学　精心因材施教

20世纪末，国内在造口康复治疗领域还基本是一张白纸，造口治疗专业的护理人才寥寥无几。1998年我应邀去澳洲考察肠癌诊治和造口康复治疗情况，当时我对时任世界造口治疗师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Elizabeth English女士提出能否派我们的护士来进修学习，考虑到语言沟通问题和费用，我们最终选择了跟香港合作，2000年选送了三名护士赴香港接受国际认证的造口治疗师培训，成为国内首批获得WCET国际认证的造口治疗师。在2001年创建起我国第一所造口治疗师学校——中山大学造口治疗师学校，开创了国内专科护理界自主培养国际认证ET人才的先河。至今，学校已经培养了215名国际认证的造口治疗师，学员辐射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我们的造口治疗师学校已经成为了在世界上知名的造口治疗师培训基地。我们医院的造口治疗师也常到国外交流，这为护士找到了一条通往世界的路。在此基础上，我希望我们的造口学校可以继续做大做强，培养更高层次护理人员——造口护理研究生，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早在1994年，我们建立了广州造口联谊会，经常举行造口人联谊活动，造口人之间互相交流术后的生活经验，互相鼓励，医护人员介绍术后饮食及护理等专业知识，是非常好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形式。我们不仅要做好造口人的随访工作，还要创办专门的造口专栏或专刊，进行造口术前咨询和术后康复治疗的专业咨询服务。始终把关爱造口人放在第一位，让他们勇敢乐观的面对人生。

写在最后

作为一名医生，希望我的医学研究能够帮助病人摆脱病痛，能够给医学新人一些启发来钻研新技术新方法，克服更多医学难题；作为一名管理者，我希望医院为民谋福祉，给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解决挂号难、病床难求等问题；作为一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希望我编写的教材能够帮助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但是除了书本知识，我更想对医学生说的是德的修养：医者父母心，对病人一定要有同情心，为病人着想，采用正确的诊疗方法，个体化用药，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人以德为本，医无德不立，不要有功利心、不要太浮躁，不要受外界坏风气的影响；不忘初心，人之初那颗与生俱来善良、真诚、进取、博爱之心。

在百度对戎铁华教授近44100个搜索结果中，几乎过半都是患者对他医术的分享与赞扬，这位刚荣获“中大资深名医”称号和任职为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胸科主任，是如此低调，却难掩光芒。自1970年8月起，戎教授在44年间，见证了医院从最初的华南肿瘤医院到如今首屈一指的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蜕变；44年间，他接受了李国材、邵令方教授的人生洗礼；44年间，他精益求精，不断创造医学的高峰。于他而言，保有一份从医的初心，不仅是上一代芳华传承下来的精神，更是未来医师所不能忘却的“本”。

风雨同舟四十载　岁月如歌话长青

——访中山大学资深名医戎铁华教授

※ 本报记者：区丹棋

一、从医生涯：“生活像傻子，工作像斗士”

20世纪70年代的华南肿瘤医院，条件并不如今，当年戎铁华教授等15名毕业生刚进院便在21名老医生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医院工作中。特殊的年代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历练，人手的紧张使得每位医生承担着繁重的工作量，外科一个医生就得管着28张病床，有的病区甚至是每位医生负责近90张病床。在这样的环境下，戎教授的日程安排也是非常紧凑，他回忆到：“那时我早上六点就起床，到楼下跑一圈，六点半上班，而医院是八点正式上班。”在比别人早到的一个半小时里，他提前完成了查房、给病人换药等等，一天忙碌的工作下来，他还要在下班后逐一记录好病历，还要进行政治学习，就这样，晚上12点能回到家都成了一种奢望。

尽管时间很紧凑，但青年时代的戎教授却并不放松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他在周一与周二把九十个病号都检查一遍，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钻研放疗等其他专业，但学习的热情有时却会受到硬件的限制。创立初的肿瘤医院，设备十分基础，五盏顶灯，一把大风扇，一些简单的手术器械，便是一间手术室里主刀医师所能操控的全部了。一台在如今常见的食管癌手术，在当时是要从早上八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才结束。将近10几个小时的手术，对医生的要求极高，不仅要基本功扎实、动作快，还要有极大的耐性，关于这一点，戎铁华教授无比感慨：“虽然医院的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简陋，但仍有不少不亚于甚至是超越现在的优秀的医生。有时候也要理解外科医生脾气暴躁，我们生活像傻子，工作像斗士。”自强不息，对技术“傻子”般的执着与痴迷，对病患的生命要像对待亲人般的严谨与负责，这是戎铁华教授这代医生在条件简陋的年代里培养起的精神，是他们毕其一生的从医宗旨。

二、化城再来人：一代人生导师的教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胸外科在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医技滞留不前，开胸手术陷入并发症多、死亡率高的困境，为同行的领头医院所嘲笑，戎教授颇为困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手术。在河南省肿瘤医院胸科进修期间，他与邵令方教授相遇，迎来了人生转折点。由于是批斗对象，邵教授白天参加工作，凌晨后负责全医院痰盂和厕所的清洗，晚上三四点还会悄悄做上两台食管癌手术，虽然拯救了病人，但家属还会站上批斗台批斗他，可他却依然无怨无悔，甚至顶着政治的压力，研发出当时先进的食道器材，独创不少精妙的手术方法。而坚韧奋进的戎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在带戎教授做手术中将自己的一切传授给他，一步步地教导，“有时会引起一些同行的妒忌，无论如何，邵令方教授奠定了我胸外科手术的基础，把我推向了人生另一高峰。”他真诚地说道。

“仁心仁术”，是病患在戎教授的留言板上写得最多的，这是与李国材院长一脉相承的高尚医德。有一回他和李院长一起巡房，遇到一位患有成骨肉瘤的青年患者，他腿上坏死的肿瘤组织加上层层草药的敷盖，滋生出了蛆虫，强烈的臭气使年轻的戎教授都受不了。但令他惊讶的是，李院长竟面不改色，从容地带上老花镜，一点一点地清洗病人的伤口，仔细地一个个取出蛆虫，又耐心地换上了新药，而戎教授一直在旁陪伴着，李国材院长对病人的细致、耐心和关怀，铸造了戎教授人生最难忘的一个半小时。戎教授身上流淌着的严谨的血液，也源于李院长的点滴教导。李院长的每一次查房，都要求医师们精确记录每一项数据，每一次的肿瘤手术都会反复强调无菌、无瘤操作，“如果有虚报会被站着骂上半小时，若手术出了半点差错，那后果更是不可想象。”戎教授仍难以忘怀当年李院长的威严。

三、全国高校附属医院首例肺移植手术与人工食管的成功

步入90年代的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的胸科在戎铁华主任的带领下，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发展迅猛，先后开展了胸部肿瘤外科的各种高难度手术。而当提起全国高校附属医院首例单肺移植手术和人工食管构建时，戎铁华教授



的脸上露出了骄傲而自信的笑容。

2005年11月29日，中大肿瘤医院胸外科成功给一名65岁的男性患者“换肺”。这位来自河北的高龄患者术前因双肺纤维化导致肺功能进行性破坏，呼吸困难，医院决定为其施行单肺移植手术。在手术中，医生在麻醉科的支持下，运用先进的器官保存技术，在3小时内完成了该病人的肺移植手术。病人手术过程中无需输血。更惊喜的是，病人在术后并无出现急性器官排斥和感染，顺利度过了术后5至10天的死亡高峰期，术后1周就无需氧气机辅助呼吸。戎教授欣喜地告知我们，这位病患活到现在为止还幸福地存活着。

医学前进的步伐永不停息，多国折戟的人工食管试验，在戎铁华教授的主持下，历时六年竟获意外成功。这段由猪的主动脉经去抗原化处理后缝制而成的人工食管，经过多次改良后终于在实验狗身上初见成果，并带来了新发现：人工食管会成为机体再生的支撑物，使植入位置再生出一条具有完整上皮、血管、腺体和神经的正常食管，这一发现甚至打破了“神经细胞不可再生”的传统医学观念。不久，“人工食管梦”在人体试验上也成真了。2004年，中大肿瘤医院为一名清远的食管癌病人进行首次人工食管植入的尝试，手术非常顺利。从进食流体到半流体食物，到最后能正常进食，病患慢慢恢复了消化吸收功能，成功痊愈。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中大肿瘤医院的胸科在戎教授的建设下，成为了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波及全国的胸部肿瘤治疗中心。回首这一路的颠簸，戎教授认为医院的团结才是制胜的关键，而医生们脚踏实地、心怀患者、淡泊名利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更是中心源远流长的根本，这也是他对后生最诚挚的告诫。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